

现代性何时进入犹太社会？

——有关犹太社会现代转型起点问题研究的演进^{*}

艾仁贵

【提要】 犹太史学界在有关犹太社会现代转型起点问题的研究上,经历了科学主义、民族主义、流散地本位、全球史的几重范式转变。19 世纪初,主张融合和同化的犹太教科学运动的学者将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起点定在启蒙与解放上;20 世纪上半叶,坚持巴勒斯坦中心史观的“耶路撒冷学派”强调,现代犹太史并不始于犹太人融入外邦主流社会,而始于犹太人与以色列故土重新恢复政治联系;而几乎与此同时,东欧和美国等地的犹太历史学者主张犹太自治以及流散地犹太社团的活力;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全球史的兴起,注重联系与互动的研究路径又将转型的起点向前推至近代早期。透过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犹太社会现代转型起点问题研究的演进脉络,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犹太史学家对于现代性的回应,同时可见时代主题和身份认同对历史分期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犹太社会现代转型 科学主义 民族主义 流散地本位 全球史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大流散民族,犹太人的历史进程存在巨大的不同步性,历史分期一直是个莫衷一是的难题。自公元 1 世纪第二圣殿被毁及 135 年巴尔·科赫巴大起义的失败起,犹太民族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大流散。对于长期处于大流散且高度分散的犹太人而言,历史分期有着非同寻常的困难。一方面,从犹太人内部来说,流散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犹太民族空前频繁的流动性。长期不稳定的生活环境致使犹太人不断地流散,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民族”,几乎散居在世界各地。这种状况致使犹太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并没有生活在共同的地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各地犹太社团的历史进程存在巨大差异性。另一方面,大流散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犹太民族整体性地生活于外邦世界之中,与异质文明的交往几乎贯穿整个犹太流散史。受异质文明的影响,漫长的流散生涯使犹太人在语言、文字、肤色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基于此,各地犹太社团的历史进程与所在地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历史的发展进程。有的居住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有的居住在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各地区犹太人的发展程度并不同步。

鉴于犹太历史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著名学者迈克尔·迈耶指出“犹太史的分期问题充满着有关世界历史分期遇到的所有方法论上的困难。由于分散在各个民族中间,犹太人不同程度地参与……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以色列移民政策史研究”(项目编号:17CSS013)的阶段性成果。

到外部文明之中,而同时他们又携带着自身的遗产。他们流散经历了非凡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对任何犹太历史分期上的一致性都产生着影响。尽管大多数犹太历史学家不得不借助某些分期系统来组织他们的材料,但他们在所使用的方式上极其不同。”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试图为所有犹太人划定有意义界限的这种尝试(即历史分期)……注定要遭到失败”。^①

尽管犹太历史分期问题存在巨大困难,但历来仍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种种尝试。就现代犹太史而言,有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究竟哪里是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起点?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困扰学者们的关键性问题。本文拟对19世纪初以来犹太历史书写中的犹太社会现代转型起点问题进行梳理,探讨其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分析在不同史学范式下的起点界定及其内涵,进而从中窥探犹太现代性起源的多元形象与复杂进程。

二、启蒙与解放:科学主义范式的兴起

19世纪初,在启蒙运动影响下,西欧犹太社会内部开始了哈斯卡拉(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以摩西·门德尔松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开始走出隔都,提倡学习现代知识、积极融入主体社会。启蒙运动对犹太教以及犹太人的存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挑战:^②它将犹太教从原来无所不包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宗教,从而使有关犹太人的社会与法律地位成为问题。当犹太教被重新定义为一个派别时,它的历史就必须作为宗教的历史来书写,正如基督教的历史一样。犹太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被用来评估犹太人是否值得在现代社会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因此,对犹太教历史的研究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成为对启蒙与解放进行回应的重要方式“重构犹太人过去的现代努力,开始于见证着犹太人生活连续性发生急剧断裂的时代,因此也是犹太集体记忆快速衰退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获得了此前从未获得的地位,即作为世俗犹太人的信仰。有史以来第一次,历史而非神圣的文本成为犹太教的裁决者。”^③在这些挑战下,一批德国犹太学者提倡用科学方法对犹太教历史进行研究,发起了“犹太教科学(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运动”,^④从而揭开了现代犹太学术的序幕。犹太教科学运动的宗旨即是,以科学精神、科学观点、科学方法来审视犹太传统文献。受此指导思想的鼓舞,以伊曼纽尔·沃尔夫(Immanuel Wolf)、利奥波德·聪茨、亚伯拉罕·盖革(Abraham Geiger)等为代表的现代学者开启了对传统犹太文献进行批判研究的先河。^⑤

在犹太教科学运动影响下,1820—1828年犹太文化与科学协会成员以撒·约斯特写出九卷本著作《从马卡比时代至今的以色列史》(*Geschichte der Israeliten seit der Zeit der Maccabaer bis auf unsere Tage*),成为第一部由犹太历史学家撰写的从圣经时代直到现代时期的犹太通史。他因此被视为古

① Michael Meyer, “Where Does the Modern Period of Jewish History Begin?” *Judaism*, Vol. 24 (Summer, 1975), pp. 329, 336.

② Michael A. Meyer, “Modernity as a Crisis for the Jews”, *Modern Judaism*, Vol. 9, No. 2 (May, 1989), pp. 151–164.

③ Yosef H. Yerushalmi, *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p. 86.

④ 1819年11月7日,爱德华·甘斯(Edward Gans)、利奥波德·聪茨(Leopold Zunz)、摩西·莫塞(Moses Moser)、以撒·约斯特(Isaac M. Jost)等人在柏林发起并成立“犹太文化与科学协会”(Verein für Cultur und Wissenschaft der Juden),该协会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犹太学学科正式确立的标志。在西文中,“犹太学”一词最早起源于19世纪初的德语世界,即“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直译过来就是“对犹太教的科学研究”(the scientific study of Judaism),意在强调走出神学意义上的《托拉》学习,而对犹太传统文献进行科学的、实证的研究。

⑤ Ismar Schorsch, “Breakthrough into the Past: The Verein für Cultur und Wissenschaft der Jude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Vol. 33 (1988), p. 22.

代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之后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犹太历史学家。从书名可以看出，他没有使用犹太人的概念而代之以以色列，后者是通常被用来仅指称宗教派别的词汇。约斯特并不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民族”，因为他们缺乏自己的疆域，而将之视为一个宗教派别。他将撰写犹太历史视为反对偏见、争取解放的有力手段“历史学家不应为任何偏见所蒙蔽，也不应为任何普遍的教条模糊了他的视线，更不应为任何恐吓而阻碍他揭示真理。他必须能够自由地思考，清楚地考察他所研究领域的对象，照亮黑暗的东西、揭开隐藏的内容。”^①为此他从历史上找到先例，将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视为现代解放的先驱；因此，正如忠诚的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被赋予完全的公民权一样，德国犹太人也应当获得同样的权利。绍尔施指出，“约斯特的成就在于以详尽的历史观点将彻底同化的计划合法化。2300 年的犹太历史被视为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为宗教畸形所扭曲的时期。”^②

约斯特在其著名的《从马卡比时代至今的以色列史》中，以 1740 年作为现代犹太史的开端，因为这一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登上普鲁士王位。他的这种分期思想，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变迁密切相关。他成长的时期，正是德国犹太人首次被赋予公民权的时代。作为对此新状况的回应，他主张与过去彻底决裂而完全参与到欧洲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去。尽管约斯特在创作这部犹太史时已处于后拿破仑时代，但他坚持认为融入主体社会是犹太人不可逆转的趋势。甚至到 1846 年，约斯特仍然认为开明专制唤醒了一种精神“它大步越过隔都高墙而进入犹太街道的沉闷角落……它宣称给予被压迫者以自由，这个词汇甚至在其内涵被掌握与领会之前，就唤起美好希望与期望美好生活的灵魂。”^③他把当前的时代视为拉比权威衰退的时代，犹太社团逐渐从自治实体转向宗教派别，犹太人对德国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在由普鲁士开始的这些变化中，他进而看到了对于所有犹太人而言的新时代的开始，并将之称为“精神解放的时代”（the age of spiritual liberation）。^④

19 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史学者无疑是海因里希·格雷兹（Heinrich Graetz）。1853—1876 年，格雷兹写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卷本著作《从远古时代至今的犹太史》（*Geschichte der Juden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auf die Gegenwart*），^⑤被誉为“19 世纪犹太学术领域出版的最为重要的作品”。^⑥格雷兹的《犹太史》影响了好几代人，成为 19 世纪有关犹太史知识的主要来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格雷兹是 19 世纪犹太教科学运动最有活力、最具才华与最为持久的实践者。他那十一卷本的《犹太史》……在一个世纪后仍然是有关犹太通史方面的最好入门著作。”^⑦如果说约斯特是书写现代犹太史的先驱，那么格雷兹就是“现代犹太史学之父”与犹太教科学运动的最重要实践者。格雷兹为犹太历史定下悲情化的基调，他对第二圣殿以后至前现代的犹太历史进行消极化的处理，认为此后的历史不再是一部正常的历史，而是体现为一种奇特的形式。在他眼中，犹太历史可以被归纳为“苦难和学习的历史”（*Leidens-und Gelehrten-geschichte*/the history of suffering and learning）：犹太人内部的历史主要是思想与学习的历史，拉比评注与答问成为十几个世纪流放历史的主要成就；而外部的历史则

① Isaac M. Jost, *Geschichte der Israeliten seit der Zeit der Maccabaer bis auf unsere Tage*, Bd. 4, Schlesinger, 1824, S. iii.

② Ismar Schorsch, *From Text to Context: The Turn to History in Modern Judais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41.

③ Isaac M. Jost, *Neuere Geschichte der Israeliten Von 1815 bis 1845*, Bd. 1, Jacobsohn, 1846, S. 7.

④ Michael Meyer, “Where Does the Modern Period of Jewish History Begin?” *Judaism*, Vol. 24 (Summer, 1975), p. 330.

⑤ Heinrich Graetz, *Geschichte der Juden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auf die Gegenwart*, 11 Bd., O. Leiner, 1853–1876.

⑥ David N. Myers, *Re-Inventing the Jewish Past: European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Zionist Return to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0.

⑦ Ismar Schorsch, “Ide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in Heinrich Graetz, *The Structure of Jewish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 1975, p. 1.

是歧视与迫害的历史,其体现形式是自从中世纪以来不计其数的纪念书、殉道文等。^①

格雷兹从犹太人的内部思想变革出发,也将现代犹太史上的最重大变革设定在此前一个世纪;但他将历史变革的关键性作用归之于某些突出的个体,认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出现是现代犹太史的起点。^②格雷兹把门德尔松称作“现代时期犹太人历史的典范,因为他们此后努力从低贱与耻辱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伟大与自觉。”^③格雷兹认为,当前犹太人迈向现代性的根本动因在于由门德尔松发端的哈斯卡拉,从而将之作为犹太现代史的开端,强调门德尔松开启了文化适应的新时代。传统上通常把中世纪与现代阶段描述为突然的断裂,认为这种转变过程是急剧而迅速的。格雷兹就强调了这个过程的突然性“当犹太人阵营中的两大拉比及其追随者就护身符问题不断骚动时……新时代的标志已经出现在欧洲上空:犹太贤哲摩西·门德尔松与外邦贤哲莱辛进入一种相互的友谊关系之中。”^④

总之,以约斯特、格雷兹为代表的犹太学者,将中世纪视为文化孤立、外部迫害与宗教蒙昧的时代。在这种视角下,现代性是随着门德尔松突然到来的,哈斯卡拉结束了中世纪的文化孤立。在门德尔松的引领下,一批马斯基尔(Maskilim,犹太启蒙分子)服膺理性,他们对非犹太文化持开放态度,与外部社会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对犹太教传统权威发起挑战,并致力于对传统文献进行科学研究,所有这些行为严重削弱了传统的力量,从而使之陷入危机之中。

三、“耶路撒冷学派”及其巴勒斯坦中心史观

19世纪70年代,以种族主义理论为“科学”基础的现代反犹主义在欧洲兴起,使得以融入主体社会为目标的解放运动宣告失败,许多西欧犹太人放弃了同化道路。东欧的反犹活动更为猛烈,1881年,由于沙俄政府的迫害,一些东欧犹太人组织了“圣山热爱运动”,返回巴勒斯坦故土定居。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标志着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1901年,马丁·布伯首次运用了“犹太民族复兴”(Juedische Renaissance)这个词组,以用来形容当时蓬勃兴起的民族运动。^⑤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尔福宣言》,成为建设犹太民族家园的里程碑事件。

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高涨,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史观开始出现。1924年底,希伯来大学犹太研究所在耶路撒冷的成立,标志着犹太研究在民族故土正式扎根。它比希伯来大学的正式创办还要早几个月。希伯来大学第一任校长犹大·马格内斯(Judah L. Magnes)将该研究所称为“一处神圣的场所,可以毫无担心和憎恨地进行学习与教授自圣经时代以来的犹太教知识的圣所”;“我们为追求

① 这种将犹太历史悲情化的观点后来被萨洛·巴龙归结为“犹太历史的流泪概念”(the Lachrymose conception of Jewish history)。

② 受格雷兹《犹太史》影响,众多犹太现代史著作将摩西·门德尔松誉为“从隔都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人”,它们几乎无不对门德尔松及其历史地位大书特书一番。这种状况乃至被大卫·索金称为“门德尔松神话”(the Mendelssohn Myth)。门德尔松俨然已经成为犹太启蒙运动与现代化的象征符号,甚至是“现代性的贤哲”(Sage of Modernity)。参见 David Sorkin, “The Mendelssohn Myth and Its Method”, *New German Critique*, No. 77 (Spring-Summer, 1999), pp. 7-28。

③ Heinrich Graetz, *Geschichte der Juden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auf die Gegenwart*, Bd. 11, S. 3.

④ Heinrich Graetz, *History of the Jews*, Vol. 5,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895, p. 290.

⑤ Martin Buber, “Juedische Renaissance”, *Ost und West*, Vol. 1 (1901), pp. 7-10.

纯科学的理想欢欣鼓舞，世界上没有比耶路撒冷更适合学习托拉（即犹太学术）的场所”。^① 该研究所提倡托拉与科学并举，其目的是：一方面，促进祖先民族传统与故土的新联系；另一方面，确保客观、科学研究的最高标准。以希伯来大学犹太研究所为中心，出现一批著名的犹太研究学者，是谓“耶路撒冷学派”（Jerusalem School）；它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称谓，指称以巴勒斯坦为中心来研究犹太历史的学者群，主要是任教于希伯来大学的学者。^②

“耶路撒冷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为伊扎克·贝尔与本锡安·迪努尔。伊扎克·贝尔是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位犹太史教授，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希伯来语学术期刊《锡安》（*Zion*）的首任编者。1936年，贝尔发表了《加路特》（*Galut*），对从圣经直到当前的犹太史进行了简要概述，他明确反对自约斯特、盖革以来将加路特^③视为犹太人向外部世界传播道义的积极解释，并将这些解释斥为“比此前任何时代有关犹太教的想法都要荒谬”；贝尔强调流散地的犹太生活是不安全的，必须通过建立国家来终结这种不自然的状态。“它（即加路特）始终是一种政治奴役，而这必须被彻底废除。……加路特意味着犹太人离开了他们的自然状态。一切离开其自然状态的东西都随之丧失了它的自然支撑，直到它返回自然状态。以色列人在各民族中的散居是不自然的。由于犹太人很显然是一个民族整体（national unity），甚至比其他民族更明显，他们返回实际的整体（actual unity）状态是十分必要的。”^④在贝尔看来，犹太人的中世纪几乎与加路特一样漫长，进入现代的标志即是结束这种政治奴役状态、重建犹太人的国家实体。

迪努尔为贝尔在希伯来大学的同事，以色列建国后一度担任教育部长。迪努尔极力提倡以以色列故土为中心观察犹太史，在对犹太史的分期问题上极其鲜明地体现了此点。对他而言，以色列的历史即是犹太史的中心，流散时期从而被大大缩减。流散并不始于通常所认为的第二圣殿毁灭，而是始于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而导致以色列地丧失了犹太“特征”；与此前的其他征服者不同，阿拉伯人的到来永久性地打破了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疆域格局，自此犹太“特征”不断被强制抹除，直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才得以遏制这一趋势。^⑤

迪努尔以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来解读犹太历史。出于对以色列故土的选择性强调，他将1700年作为现代犹太史的起点，因为在这一年拉比虔诚者犹大（Rabbi Judah the Pious）率领一千名波兰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定居。^⑥ 对于迪努尔来说，这个象征性事件对后来的复国主义有着深远影响，它代表着对流放命运进行反抗的开端，而开始致力于在民族故土寻求以色列人的集体拯救。迪努尔赋予这一事件以特殊的意义，认为它吹响了犹太人返乡复国的号角，而没有其他事件“对这

① David N. Myers, “Between Diaspora and Zion: History, Memory, and the Jerusalem Scholars”, in David N. Myers & David B. Ruderman, eds., *The Jewish Past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Modern Jewish Historia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2–93.

② “耶路撒冷学派”这一术语最初在1926年由来自加利西亚的学者迈耶（L. A. Mayer）使用，以表达为犹太学术建立一种新的“科学”标准之期望。该学派的主要代表有，约瑟夫·克劳斯勒（Joseph G. Klausner, 1875–1958）、伊扎克·贝尔（Yitzhak Baer, 1880–1981）、本锡安·迪努尔（Ben Zion Dinur, 1884–1973）、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 1897–1982）、哈伊姆·本·萨松（Haim Hillel Ben Sasson, 1914–1977）等。参见 David N. Myers, “Was There a ‘Jerusalem School’? An Inquiry into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ers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Jewry*, Vol. 10 (1994), pp. 66–92.

③ “加路特”（*Galut*）系犹太神学对流放、放逐行为的传统称谓，认为犹太人因其罪孽而被迫从以色列故土放逐、四处流散，直到他们进行真诚的悔罪为止，它被视为上帝用来惩罚其子民背弃行为的最为痛苦的方式。

④ Yitzhak Baer, *Galut*, translated by Robert Warshaw, Schocken Books, 1947, pp. 118–119.

⑤ David Myers, “History as Ideology: The Case of Ben Zion Dinur, Zionist Historian ‘Par Excellence’”, *Modern Judaism*, Vol. 8, No. 2 (May, 1988), p. 177.

⑥ Ben Zion Dinur, *Israel and the Diaspor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p. 90.

场移民之后现代犹太史的所有不同道路具有如此深厚和持续的影响”。^①在他看来,现代犹太史并不始于犹太人融入外邦主流社会,而是始于犹太人与以色列故土重新恢复政治联系。迪努尔认为,当前犹太民族的首要任务,即是在历史性的故土重建国家,而这才是犹太人获得现代性的根本前提。

“耶路撒冷学派”的学者大多出生于饱受反犹主义困扰的欧洲流散地,随后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下来到巴勒斯坦故土,因而对犹太复国主义有着深刻的认同,形成了所谓的“巴勒斯坦中心”(Palestino-centric)史观。它高度强调民族与土地的联系,主张只有回归故土才能实现犹太历史的正常化,流散势必导致犹太人的异常以及反犹主义。用劳伦斯·西波斯坦的话来说,“耶路撒冷学派”眼中的犹太民族的基本特征可以“被划定、被界定、被描绘。一种实质的犹太性的概念包括一个在历史上有着连续存在的统一、凝聚实体的预设,以及它的基本特征从未发生变化。”^②可以说,这批学者对犹太史的看法代表着现代犹太史学中的一种新趋势,即民族主义史学范式的出现,它不同于西欧学者的个体解放思想以及东欧学者的流散地本位观念。其政治诉求以理想中的圣经时代为目标,主张回归犹太民族的故土,从而最终实现民族的救赎。

四、来自流散地历史学家的视角

对于西欧犹太人积极融入主体社会主张的排斥,除了来自在巴勒斯坦故土进行民族复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外,还来自主张流散地本位的犹太历史学家。这些流散地历史学家既不赞成西欧犹太知识分子的同化论,也不同于“耶路撒冷学派”的故土民族主义立场。这种流散地本位观念在二战之前的东欧、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的美国有较大市场。这批史学家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17世纪的荷兰等流散犹太社团为例,强调流散地犹太人通过和外部世界开展不同形式的交流与互动,保持着惊人的创造力。流散地历史学家对现代犹太史起点的不同阐释,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流散地与以色列故土之间的紧张关系。

20世纪初,俄国著名犹太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致力于书写一部犹太民族流散的世界史。在完成三卷本的《俄国与波兰犹太人的历史》之后,他于1925—1929年推出十卷本《犹太民族的世界史》(Die Welt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③他认为,漫长的流散经历使犹太人成为“世界民族”(world-people),在古代以色列国家消失后,犹太民族形成了一些“地理中心”:古代的巴比伦、中世纪的西班牙与德语国家、中世纪晚期与现代阶段的波兰与立陶宛、当代的波兰与俄国;犹太人从中世纪开始成为并一直作为一个“欧洲民族”,在思想、科学、文学、艺术、音乐等方面对欧洲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④

在此基础上,杜布诺夫提倡“自治主义”(autonomism),认为犹太人应当享有充分的民族—文化自治地位。与犹太复国主义不同,杜布诺夫的民族自治思想被称为“流散地民族主义”(diaspora

① Ben Zion Dinur, *Israel and the Diaspora*, p. 94; Uri Ram, “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Jewish Nationhood: The Case of Ben Zion Dinur”, *History and Memory*, Vol. 7, No. 1 (Spring-Summer, 1995), pp. 91–124.

② Laurence Silberstein, “Towards a Postzionist Discourse”, in Miriam Peskowitz & Laura Levitt, eds., *Judaism since Gender*, Routledge, 1997, pp. 95–96.

③ Simon Dubnow, *Die Welt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10 Bd., Jüdischer Verlag, 1925–1929.

④ Michael Brenner, *Prophets of the Past: Interpreters of Jewish History*,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98.

nationalism)。在杜布诺夫看来,这种流散地民族主义代表着民族主义运动的最高形式,因为它的产生及发展脱离了自己的领土,犹太人跳过了民族发展的寻常阶段而构成一个精神民族。换言之,犹太人是唯一一个无须拥有自己领土和国家的民族。杜布诺夫将政治转型而非文化转型作为犹太现代性开端的根本标准。在《犹太民族的世界史》中,他以法国大革命作为犹太现代性的起点,因为犹太人首次被正式赋予公民身份,自此以后犹太人开始了政治解放的伟大进程。与格雷兹将犹太历史看作犹太教在“观念上的反映”不同,杜布诺夫视之为一个超越于时间与空间之外的“民族有机体”。他将现代犹太史分为两大分支:①以解放与同化为标志的西欧中心、犹太自治得以充分发展的东欧以及美国中心。杜布诺夫的重要贡献在于,以东欧取代原先以德国为中心的历史视角,主张从民族而非文化或宗教来书写犹太历史,但其民族观念是以流散地为本位的。

20 世纪上半叶,随着大批犹太移民涌入,美国逐渐发展为犹太研究的新中心。具有突出意义的事件就是,美国主流大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首次设立了犹太研究讲席,哈里·沃尔夫森(Harry Wolfson)与萨洛·巴龙(Salo W. Baron)分别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犹太研究的讲席职位。这是犹太教科学运动的德国先辈们几代人都无法实现的梦想。② 1937 年与 1942 年,萨洛·巴龙陆续推出《犹太人的社会与宗教史》(*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1952-1983 年扩展为十八卷)与《犹太社团史》,③标志着犹太社团研究的高峰。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三大根本原则:探讨犹太历史上社会力量与宗教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犹太社团与其周边社会之间的联系;反对将犹太流散史视为一部充满歧视与迫害的血泪斑斑的苦难史。

巴龙试图将犹太人纳入外部社会的发展之中,强调犹太人适应极端条件的能力及其在极端痛苦条件下的创造力。1928 年,巴龙在其论文《隔都与解放:我们是否应当修正传统的观点?》中提出了“犹太历史的流泪概念”(the Lachrymose conception of Jewish history),④对传统的犹太史书写发起颠覆性的挑战。巴龙一反包括约斯特和格雷兹在内的许多学者将犹太人进入现代之前的历史视为黑暗的受难史、而解放则是崭新的美好时代的观点,认为中世纪犹太人的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他们仍然保持了极大的创造力并积极参与到周围的环境之中,而解放后犹太人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相反充满着更大的危险。他强调 17 世纪犹太社团内部的思想与经济变迁具有决定性意义,基于此,他将现代犹太史的开端放在 17 世纪中叶的荷兰,而斯宾诺莎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⑤ 实际上,巴龙反对将解放理想化的观点,是犹太解放运动已遭到彻底失败的学术反映,而美国犹太人作为流散地的代表,其创造力正在体现出来。根据巴龙的传记作家罗伯特·里贝勒斯的说法,巴龙的首要目

① Simon Dubnow,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Essays on Old and New Judaism*, edited by Koppel S. Pinson,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8, pp. 40-41.

② 1925 年,哈佛大学在美国主流大学中率先建立犹太研究系,并任命沃尔夫森为系主任以及内森·利特塔尔希伯来文学与哲学讲座教授(Nathan Littauer Professorship of Hebrew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四年后,哥伦比亚大学将内森·米勒犹太史讲座教授职位(Nathan L. Miller Professor of Jewish History)授予当时年仅 34 岁的萨洛·巴龙。参见 Frederick E. Greenspahn, “The Beginnings of Judaic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Modern Judaism*, Vol. 20 (2000), pp. 209-225.

③ Salo W. Baron,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3 Vol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7; idem,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18 Vol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1983; idem, *The Jewish Community: Its History and Structure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3 Vols.,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2.

④ Salo W. Baron, “Ghetto and Emancipation: Shall We Revise the Traditional View?” *Menorah Journal*, Vol. 14, No. 6 (June, 1928), pp. 515-526.

⑤ Salo W. Baron,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Vol. 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 164-165.

标就是“犹太历史的正常化”^①。与“耶路撒冷学派”的正常化不同的是,巴龙致力于在流散地实现正常化。

与巴龙一样,任教于牛津大学的英国犹太历史学家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也反对“犹太历史的流泪概念”,强调犹太人在流散地的创造力。1932年罗斯发表《最受迫害的民族?》^②一文,驳斥所谓犹太史上的黑暗中世纪的说法,认为犹太人在流散地创造出许多杰出的文化成就;他还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犹太人的贡献为例来证明犹太人在流散时期的创造力“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我们有着成功融合的独特现象,而这许多在今天都是无法实现的愿望。那些翻译阿威罗伊著作的犹太人获得物理学家的声望,他们还从事天文志的编纂、戏剧的创作与表演、音乐的谱写等等,几乎遍布于各个领域……”^③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先后出版了《犹太人对文明的贡献》(1938年)、《意大利犹太人的历史》(1946年)、《文艺复兴中的犹太人》(1959年)等著作。^④

五、犹太社会通向现代的道路:单数还是复数?

传统的犹太史学通常把从中世纪转向现代阶段描述为突然的断裂,认为这种转变过程是急剧而迅速的。以约斯特·格雷兹为代表的犹太历史学家,把中世纪视为文化孤立、排外与宗教蒙昧的时代,而给予犹太人某种政治或文化自由的穆斯林西班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这种状况的仅有例外。在这种视角下,现代性是随着门德尔松突然到来的,哈斯卡拉结束了中世纪的文化孤立,法国大革命与解放法令赋予了政治权利,犹太教改革运动则开始走向世俗化与现代化。^⑤实际上,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相反它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不少学者指出,在中世纪与现代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被称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过渡阶段既有传统社会的因素,同时也蕴含着新时代的某些特质,从而使现代性得以孕育成长。在此影响下,犹太学者逐渐接受了在16世纪与18世纪末之间存在一个独特历史单元的观点,认为这一时期具有既不完全属于中世纪也不完全属于现代的某些特质,这些特质超越了地理与民族的边界,而在欧洲世界具有大致类似的共性。

著名学者雅各·卡茨(Jacob Katz)是研究近代早期这一转型时期的开创性学者,他发表了犹太社团史研究的“三部曲”——《传统与危机:中世纪末期的犹太社会》、《排外与宽容:中古与现代时期

① Robert Liberles, *Salo Wittmayer Baron: Architect of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1.

② Cecil Roth, “The Most Persecuted People?” *Menorah Journal*, Vol. 20, No. 2 (July-September, 1932), pp. 136-147. 罗斯妻子给他传记的副标题取名为“没有眼泪的历史学家”,参见 Irene Roth, *Cecil Roth: Historian without Tears: A Memoir*, Sepher-Hermon Press, 1982.

③ Cecil Roth,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9, p. xi.

④ Cecil Roth, *The Jewish Contribution to Civilization*, Macmillan & Co., 1938; idem,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taly*,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6; idem,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9, etc.

⑤ Moshe Rosman, “Haskalah: A New Paradigm”,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97, No. 1 (Winter, 2007), p. 132. 传统观点认为,哈斯卡拉是犹太现代化的原动力,它不仅瓦解了传统的犹太社会结构,而且开启了犹太社会在宗教、思想、政治、文化与经济等领域迈向现代化的一系列进程。然而,这种观点受到来自英国、荷兰等地犹太人的情况的挑战,有学者指出,这些地区犹太人的现代化并没有经历哈斯卡拉的过程。参见 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Georgian England, 1714-1830*,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79; Irene E. Zwiep, “Jewish Enlightenment (almost) without Haskalah: The Dutch Example”, *Jewish Culture and History*, Vol. 13, No. 2/3 (2012), pp. 220-234.

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关系研究》、《走出隔都：犹太解放的社会背景（1770—1870）》，^①这三部著作对转型时代的阿什肯纳兹社会（尤其以德国为中心）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史分析。卡茨提供了一个有关犹太现代性起源的新视角，他将犹太传统社会的范围定为从塔木德时代（公元200年左右）到19世纪初的解放时代，而这个传统社会出现危机、走向崩解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16世纪到18世纪下半叶（具体时间为1650—1750年）就是“传统的危机期”，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多此前没有过的新现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理性主义与宗教宽容的成长、一些犹太人开始对传统权威进行质疑、宫廷犹太人的崛起（他们领导着争取犹太人权利的斗争），等等。^②

卡茨对“耶路撒冷学派”提倡的巴勒斯坦中心史观提出了批评。他并不否认以色列地在整个犹太历史中的重要性，但他批评迪努尔等人过分政治化的历史观，尤其对其将现代犹太史的开端定在1700年一群波兰犹太人移居圣地的行为，斥为站不住脚。^③卡茨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倡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来关注犹太传统在现代世界中的维系，与周围社会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将犹太社会转型的时间向前推移至16、17世纪。卡茨的不足之处是，过分集中于对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团的分析，几乎忽略了人数更为庞大的塞法尔迪犹太社会。^④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介于犹太中世纪和现代犹太史之间的“近代早期”，时间范围为1450—1750年。学者乔纳森·以色列（Jonathan I. Israel）通过对重商主义时代的犹太人进行分析，认为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大概从1570年左右开始，“一种更加自由、更为流动的社会与文化体制”允许犹太人进入欧洲主流的文化、社会与经济之中，在此过程中犹太人从许多传统束缚中摆脱出来，其结果是他们对西方社会（特别是1650—1713年）产生了更加显著和持久的影响。不过他又指出，这个阶段没有持续多久而被中断，导致1700年之前的犹太社会整合与1789年的犹太社会整合并无延续性，18世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停滞、衰退与贫困的时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⑤迪安·贝尔将“近代早期”的时间范围界定为1400—1700年左右，从人口状况、社团生活、宗教认同与外部关系等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犹太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⑥大卫·鲁德曼在其《近代早期的犹太人：一部新文化史》中提出，在近代早期的犹太人中间出现了与中世纪以及与此后都不同的五大新特征：频繁的流动、社团的整合、知识的爆炸、拉比权威的危机、认同之间的混合等，从16世纪开始阿什肯纳兹人和塞法尔迪人两大群体中都出现了十分频繁

① Jacob Katz, *Tradition and Crisis: Jewish Society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1 [Hebrew in 1958]; idem, *Exclusiveness and Tolerance: Studies in Jewish-Gentile Relations in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 Clarendon Press, 1961; idem, *Out of the Ghetto: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Jewish Emancipation, 1770 - 187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② 有关卡茨对犹太现代性的研究，参见 David Harry Ellenson, “Jacob Katz on the Origins and Dimensions of Jewish Modernity: The Centrality of the German Experience”, in idem, *After Emancipation: Jewish Religious Responses to Modernity*,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2004, pp. 51 - 79.

③ Yosef Salmo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f Jacob Katz: On the Origins of Jewish Nationalism”, *Jewish Social Studies*, New Series, Vol. 5, No. 3 (Spring-Summer, 1999), pp. 161 - 179.

④ 据统计数字，中古与近代早期绝大部分的犹太人口为塞法尔迪人，他们构成犹太世界的绝大多数。1300年，塞法尔迪人口占世界犹太人口的93%，此后塞法尔迪人口比重有所下降，1500年塞法尔迪人口占67%，但1650年仍占犹太总人口的59%，直到1700年阿什肯纳兹人口总数才与塞法尔迪人口总数相持平。参见 Dean Phillip Bell, *Jew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Clarendon Press, 1985, p. 36.

⑤ Jonathan I. Israel,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550 - 1750*, Clarendon Press, 1985.

⑥ Dean Phillip Bell, *Jew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的社会流动与思想交流活动,为19世纪初的犹太社会转型最终奠定了坚实基础。^①

在提倡联系与互动的全球史路径影响下,犹太史学又经历了新的范式转换。这种研究路径侧重以近代早期的塞法尔迪人为中心,探讨这一群体对在殖民扩张与海洋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发掘塞法尔迪犹太人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这种研究视角打破了传统上以阿什肯纳兹人为中心探讨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路径。1997年,布朗大学举办了“犹太人与欧洲在西半球的扩张”(The Jews an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in the West)学术会议,会后结集出版的著作《犹太人与欧洲向西半球的扩张,1450—1800》^②推动了学界对犹太人参与到欧洲在西半球扩张活动的研究。在此影响下,不少学者开始注意到近代早期的许多塞法尔迪人遍布当时主要港口城市的现象,从而提出所谓的“港口犹太人”概念^③。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后,随即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兴趣。2001年与2003年围绕这一主题先后在南安普顿大学和开普敦大学举行了两次大型学术研讨会“港口犹太人:世界性海洋贸易中心中的犹太社团,1550—1950”(Port Jews: Jewish Communities in Cosmopolitan Maritime Trading Centres 1550—1950)以及“大西洋的港口犹太人”(Port Jews of the Atlantic)。^④“港口犹太人”概念的提出,准确地把握了近代早期塞法尔迪人的群体性特征,即强调他们的港口与海洋属性,这与传统意义上以从事陆地贸易为主的犹太商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最近的研究表明,^⑤自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起,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尔迪人遍布于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等海域的重要港口城市和殖民地(例如阿姆斯特丹、利沃诺、伦敦、波尔多、纽约、苏里南、圭亚那、库拉索、巴巴多斯、牙买加、累西腓等),他们成为进行殖民扩张与开展海外贸易的中坚力量,主要从事与殖民地贸易有关的经济活动,包括奴隶贸易、蔗糖贸易、烟草贸易、钻石贸易等。^⑥在参与洲际性贸易的过程中,以塞法尔迪人为主的港口犹太人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到16、17世纪,这些塞法尔迪人已被视为文化适应较为成功的少数群体。因此,活跃在大西洋两岸的塞法尔迪人也是犹太现代性的孕育者,甚至比传统的两大阿什肯纳兹典型——宫廷犹太人和马斯基尔要早一两个世纪。可以说,以塞法尔迪人为主体的港口犹太人代表着犹太人参与并融入主体社会的另一种方式,在哈斯卡拉之外开辟了“通向现代的另一条途径”,^⑦促进了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

① David B. Ruderman, *Early Modern Jewry: A New Cultur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在此之前,罗伯特·邦菲尔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犹太社团为例,认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存在着广泛的互动,从而导致出现了一些与此前中世纪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动向,参见 Robert Bonfil, *Jewish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② Paolo Bernardini & Norman Fiering, eds., *The Jews an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in the West, 1450 to 1800*, Berghahn Books, 2001.

③ “港口犹太人”(Port Jews)特指1492年西班牙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后到18世纪末活跃在地中海与大西洋乃至印度洋海域、主要从事跨地区海洋贸易的犹太人,这个概念最初由学者路易丝·杜宾与大卫·索金于1999年提出。参见 Lois C. Dubin, *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 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David Sorkin, “The Port Jew: Notes Toward a Social Type”,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Vol. 50, No. 1 (Spring, 1999), pp. 87—97。

④ 这两次学术会议都在会后将论文结集出版,参见 David Cesarani, ed., *Port Jews: Jewish Communities in Cosmopolitan Maritime Trading Centres, 1550—1950*, Frank Cass, 2002; David Cesarani & Gemma Romain, eds., *Jews and Port Cities 1590—1990: Commerce, Community and Cosmopolitanism*, Vallentine Mitchell, 2006。

⑤ Adam Sutcliffe, “Sephardic Amsterdam and the Myths of Jewish Modernity”,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97, No. 3 (Summer, 2007), pp. 417—437. 有关的著作,参见 Paolo Bernardini & Norman Fiering, eds., *The Jews an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to the West, 1450 to 1800*, Berghahn Books, 2001; Jonathan I. Israel, *Diasporas within a Diaspora: Jews, Crypto-Jews, and the World Maritime Empires (1540—1740)*, Brill, 2002; Richard L. Kagan & Philip D. Morgan, eds., *Atlantic Diasporas: Jews, Conversos, and Crypto-Jews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500—180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etc.

⑥ 有关港口犹太人对殖民地贸易的参与情况,参见艾仁贵《港口犹太人对近代早期跨大西洋贸易的参与》,《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

⑦ Yosef Kaplan, *An Alternative Path to Modernity: The Sephardi Diaspora in Western Europe*, preface, Brill, 2000.

结 语

犹太社会现代转型起点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讨现代性何时进入犹太社会。由于自从大流散以后犹太人几乎散居于各地，各地犹太人的历史进程并不同步，因此，现代性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或以同样方式影响所有犹太人：有的地区早已随主体社会先行跨入现代社会，而有的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仍处在前现代社会。尽管如此，现代性对于不同地区的犹太人而言普遍都是一个外来事物。一般认为，欧洲式的现代性是最为典范的现代性，因而现代化通常作为一种追赶阶段，后发国家与民族致力于效法或者变成欧式的社会。在主体社会的影响下，对现代性的吸纳与调适成为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核心主题，由此也给犹太身份认同带来尖锐的挑战，从而出现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与许多后发国家和民族一样，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并不顺利，启蒙与解放的美好前景潜伏着犹太认同丧失的危险，尤其以否定犹太人为特征的现代反犹主义也是现代性的衍生物；在融合和同化的道路受挫后，“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转而成为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强力催化剂，也是凝聚现代犹太认同的最重要资源。

现代犹太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与犹太社会的现代化相磨相荡，历史研究成为进行自我理解、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学者迈克尔·迈耶指出，“对于现代犹太人来说，有关他们过去的概念不只是学术问题，它对其自我界定十分重要。当代形式的犹太认同都植根于对犹太历史的某种认知，而这成为他们的维系手段并被用于使其合法化。”^①对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犹太人而言，启蒙与解放运动等外部重大事件直接促成了犹太现代性的发端，现代性即是冲破隔都围墙、融入主体社会，约斯特、格雷兹等人的史学著作充当了犹太人争取解放的武器。随着19世纪末现代反犹主义的兴起，解放遭受重大挫折，伊扎克·贝尔、迪努尔等“耶路撒冷学派”学者强调现代性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面前，政治解放与文化整合都只能处于次要地位；认为犹太现代性的原动力来自民族自身，犹太民族的自我觉醒（即返回故土重建国家）才是犹太社会迈向现代的标志。20世纪上半叶，由于美国等国的流散社团的崛起，以萨洛·巴龙为代表的流散地学者反对将解放理想化，强调流散地犹太人通过和外部世界开展不同形式的交流与互动，保持着惊人的创造力。进入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学者们逐渐超越了从前以阿什肯纳兹人作为中心来分析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路径，将视线转向近代早期的塞法尔迪人群体，意识到犹太现代性的道路不止一条，强调活跃在大西洋两岸的塞法尔迪人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性交流与互动，从而开创出一条不同于阿什肯纳兹人的现代转型之路。通过梳理近两个多世纪以来犹太史学家对犹太社会现代转型起点问题的研究脉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分期与其时代主题和身份认同密切相关，是他们回应现代性挑战的深刻缩影。

（作者艾仁贵，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邮编：475001）

（责任编辑：景德祥）

（责任校对：张文涛）

^① Michael A. Meyer, *Ideas of Jewish History*, Behrman House, 1974, p. xi.

class only for criticizing their role in history. In so doing, he swept aside the obstacles in evaluating the bourgeoisie on a factual base for their contribution at some stage of history when they rose in challenging feudalism. Later, by uphold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he inaugurated a new paradigm in the stud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bourgeois class, which was termed "Studying the Context or the Soil of Social History." Zhang advocated a new research vision and new methods: examining connections from past events to the present and drawing parallels between similar but geographically separated events. He developed a series of insightful opinions on the concept, pattern, category and scope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bourgeoisie; all of which improved th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ield. As a celebrated scholar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Zhang Kaiyuan not only made significant and influential contributions in empirical study, but he also developed profound research theory and techniques for the field. The stud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as benefited greatly from his scholarship.

Ai Zhouchang and His Study of African History // Zhang Zhongxiang

The study of African history began more than a half century ago in China. Thanks to the contributions of scholar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the field has achieved a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e meantime,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Chinese studies of African history remains behind. China's rapid rise as a world power and its closer relation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decades have provided an opportune time for Chinese African historian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field better into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view what has accomplished in the past. As a member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African historians trained in China, Ai Zhouchang is a respected and influential scholar in the field.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Ai's career, focusing on his persp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specific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It is meant to b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i Zhouchang's scholarship in African history.

When Did Modernity Begin in Jewish Society?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Jewish Society // Ai Rengui

On the issue regarding whe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Jewish society began, Jewish historiography has undergone several paradigm shifts as follows: scientism-nationalism-Diaspora standard-global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Wissenschaft* scholars who advocated Jewish integration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believed that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Jewish society began with Haskalah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upholding the Palestino-centric historical view, the Jerusalem School stressed that modern Jewish history did not star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Jews into the mainstream foreign society, but began with the re-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ties between the Jews and their homeland.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Jewish historians from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dvocated Jewish autonomy and the vitalit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the Diaspora. Then from the 1980s, with the rise of global history that focuses on contacts and interactions, scholars push the research into the early modern era for discussing Jewish modernity. The evolution of these different historiography paradigms has reflected various responses to modernity among Jewish historians of different ages. The historiography has registe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times and identity politics.

Women's History and Gender History in France from the 1970s // Yuan Lili

The challenge facing women's history and gender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how to prove that the studies are both scientific and legitimate academic fields. French women and gender historians faced the same challenge. In writing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n French 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 from the 1970s on two fronts. One is to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history per se to the combined interest in 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 The other is to analyze the categorical change from women to gender as a 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research. The French example shows that women's history changed from targeting male-centered historiography for criticism to analyzing the gendering process of all actors in history; the latter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and reconstruct historical study by taking women's, gender and/or combined perspectives. These changes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 that the fields have become both scientific and legitimate.